苏轼与陆贽

俞纪东

在我国古代散文史上，骈散之争由来已久。唐宋以后，“八大家”、“唐宋派”、“桐城派”名重文坛，骈文为人所羞称，骈文家的地位日低。但是，唐代骈文大师陆贽的声望却始终未为古文家所掩，正如《鸣原堂论文》说的：陆贽文章“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及。”①

韩愈和陆贽的关系暂且不论。苏轼，是北宋古文运动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说：“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②苏轼在《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中还说：“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茅坤认为苏轼的这篇札子是“所最得意识见，亦最得意条奏。”③对陆贽如此推崇，这在唐宋及后代古文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在苏轼关于前代文人的评论中也是罕见的。

苏轼这样敬慕陆贽，是与他独特的经历有关的。苏轼兄弟从小就受到他们的父亲苏洵的影响：“（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④可见，苏轼早年所接触的就是战国、两汉作品和“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⑤的陆贽奏议，这些文章对苏轼的影响无疑是深刻和长远的。

嘉祐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仅任殿中函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他上书神宗皇帝“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⑥针对此举，茅坤曾指出：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大略摹仿陆宣公奏议来”，“其指陈利害似贾谊，明切事情似陆贽。”⑦在批评王安石新政中，苏轼与陆贽也更为接近了：他“两上书言新法不便，不见省复，拟进士对策上之，以冀神宗之一悟。考其时，轼官权开封府推官耳，疎远下僚，非若两制大臣，与国同休戚，而勤拳恳款无异陆贽为内相时，非其忠孝天性，郁于中而发作于外，视民之疾苦若己身之痾瘵者而能然哉！”⑧

苏轼敬慕陆贽，这与他的文学主张有关系。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宋初的文人受功利主义的影响，都很重视策论奏议的写作，苏轼也是这样。苏轼认为，文章不仅要“出于人情”⑨，而且要“有适于用”⑩。陆贽的奏议，“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劝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⑪因此，苏轼感到陆贽的奏议最切实用：“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⑫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苏轼甚至担心陆贽的奏议得不到流传："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⑬于是，他将陆贽奏议加以校正，进呈哲宗，一方面是寄希望于皇帝，"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⑭另一方面也是"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⑮可见，苏轼关于陆贽奏议的所言所作所思，实际正是他"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⑯的文学主张的集中反映。

在创作上，尤其是策论奏议中，陆贽对苏轼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们作品中一脉相承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贵本亲用的立意、高屋建瓴的结构、深切著明的表达与纡余委备的风格上。

《新唐书·陆贽传》称赞陆贽的奏议"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刘熙载也说："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若论其实，陆象山最说得好：'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⑰这里所说的"仁义"的内涵，与孔孟或宋儒讲的"仁义"当然不同，苏轼是这样认为的："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⑱所谓"就仁义上说事"，也就是指陆贽上疏奏谏，往往有针对性地先说圣贤哲人如何做，按理应该是怎样的，先取好位，而后转到实际问题上来，剖明事理，或言今事之非而应去之，或论当务之急而劝立之。这样立意，文章就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笼罩一切之势，大大增强了感染力。在《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中，陆贽就是从天子之富"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出发，分析设立二库之非，规劝德宗废除私库。而《收河中后请罢兵状》则根基于圣王任德不任兵的观点，辨明当时的时局形势，进言德宗崇德施惠、息兵休民。又《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也先论欲理天下，必得人心，人之所助，在信与诚，然后一一驳斥德宗的疑虑，谏劝德宗推诚彰信、任人纳言。再如《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也是先言"爵赏刑罚，国之大纲"，再结合当前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当今所病，方在爵轻，所以不宜随意赏官，而应改赏钱帛。总之，陆贽的奏议，"贵本亲用，既非瞀儒之迂疎，亦异杂霸之功利，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⑲苏轼的策论奏议，尤其是熙宁四年外任前的作品，在立意上往往也有这样的特点。

与贵本亲用的立意相表里，在文章结构上，陆贽和苏轼都喜采用高屋建瓴、先立地步的方法。苏轼的作品《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以"吾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则兵易解而功易成"几句领起，然后详析北宋与西夷的利害关系，提出"叛则讨之，服则安心"，"全其首领，以累其心"的建议。又《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开头也是先称"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废兴成毁，皆若有数。惟圣人在上，则兴利除害，易成而难废。"接着陈述西湖堙塞现状，列数西湖不可废的种种原因，最后推出开浚的意见。《上神宗皇帝书》在整体结构上似乎看不出这种特点，但分论"三愿"时，却又类属此写法："结人心"一层是以"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领起；"厚风俗"一层则首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而"存纪纲"一层劈头即是"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几句。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的立意尤为新奇，杨慎说："古之谏用兵，只说不胜之害，务以避害而趋利。此书说虽胜，其害犹不可言。况以当今时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事、天时观之，动必不胜。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⑳而此文在结构上也是高屋建瓴，先从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说起的。

陆贽善“论事”，他的奏议在表达上具有“深切著明”的特点。权德舆说：朱泚乱起，陆贽“从幸奉天，时车驾播迁，诏书旁午。公洒翰即成，不复起草。初若不经思虑，及成而奏，无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㉑对于这一点，朱熹也极为佩服：“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㉒而苏轼的策论奏议也写得昭晰无疑，“明切事情似陆贽”。他们的文章之所以具有这样相同的特点，固然是由于在表达上都喜采用白描手法，语言朴厚浅近，不用典故，词无所避，意无所隐，这是众所周知的。除此之外，还与他们善于运用必要的修辞手法有关。

陆贽的奏议几乎无句不对，而且他常常将正反相对的两种情况并列起来论述，形成强烈的对照，使是非曲直具现。如《论缘边守备事宜状》说：“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后先。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为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两相比较，可见丧乱之后复欲兴兵，确是“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了。又《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称：“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长，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此王者所以节财力、砺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则贵贱有章，丰杀有度，东服田宅，莫敢僭逾，虽积货财，无所施设，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穷，圣王能使礼让兴行，而财用均足，则此道也。其制委，则法度不守，教化不从，唯货是崇，唯力是骋，货力苟备，无欲不成，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蓄群黎，隶役同辈，既济嗜欲，不虞宪章，肆其贪惏，曷有纪极？”把利害关系说得清清楚楚，闻者不能不为之动容。

苏轼的策论奏议也不乏排偶之处，两相对言比较的句子也比比皆是。其《上神宗皇帝书》称“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这就使苏轼“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贫富强”的观点显得更为有力。又“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也就很自然地说明了宋代开国以来为防内重之弊而注重委任谏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再如《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说：“圣人之兵，皆用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这些话对比鲜明，“真可为万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生事者之戒。”㉓再如《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写道：“至于救灾恤患，尤当在早。若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不过宽减上供，粜卖常平，官失无大，而人人受赐，今岁之事是也。若救之于已饥，则用物博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仓，亏损课利，官为一困，而已饥之民，终于死亡，熙宁之事是也。”是非取舍，也不言而明，这样，苏轼就为来年的救灾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条件。

陆贽在奏议中还很注意运用比喻，籍之以明事理。德宗即位之初，召陆贽为翰林学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士，时两河、淮西兵久不决，京师空虚。陆贽上《论关中事宜状》，称："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闻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大小适称而不悖焉。……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则不悖，处则不危，斯乃居重驭轻，天子之大权也。"通过比喻，陆贽形象地说明了军事力量的设置应内重外轻的道理。而且，陆贽远上疏德宗，以"舟水"之喻晓喻"审察群情"之理。可见陆贽真是巧于用比，因为魏征就曾用舟水之喻对太宗进行过规谏，而德宗是所谓"中兴之主"，他想振作起来，刷新政治，当然不会与太宗背道而驰，因此，这个比喻不仅突出了"审察群情"的重要性，而且也容易打动德宗之心。

苏轼亦长于比喻，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以养生喻"厚风俗"："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恣嬴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恣嬴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这样，不仅把道理讲得更为明白，也进一步突出了"厚风俗"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又《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也是用治病服来药来喻治国："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者；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比之贴切，事理当然也就显得深切亮丽了。再如《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说："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奕碁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奕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以操舟、奕棋为喻，把自己希望哲宗静观数年、辨明利害的心愿既形象又有力地表达了出来。苏轼还用博喻来论事说理，《上神宗皇帝书》称："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本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真是一气呵成，势在必得了。

陆贽与苏轼都洞悉民情，笔端常带感情，因此他们的奏议写得真意笃挚，情理兼至。权德舆说，陆贽在奉天所拟的诏书，传到各地，"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21]而黄震也称：苏轼"尤长于指陈时事，述叙民生疾苦……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使岩廊嵩高之处，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人能不恻然感动者。"[22]陆贽、苏轼奏议中的这种强烈的感染力，其实也是跟他们行文中善用复笔有关系的。譬如陆贽的《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文章一开头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接着在叙述两河、淮西之乱后，又一次强调了这个观点。然后再以平田悦之叛来说明"克敌之要"四句。用平田悦后形势的变化来解释"将非其人者"四句。回返照应，推理曏势，不惮谆复。将道理说透后，才敦促德宗靖本救末。这样，整篇文章显得"曲折往复，娓娓不倦，读之只见诚意蕴结而不嫌其浩汗。"[23]刘熙载也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曾说："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第昂辨折有所难行，而行余委备可以巽人。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㉗这种沈切之意就是在回环往复的阐述中显露出来的。苏轼的策论奏议亦然。如《奏浙西灾伤激一状》首称"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而后落到救灾恤患上来，将今岁救民于未饥与熙宁间救民于已饥对比言之。接着再详叙熙宁之失，在于不先事处置之故；而今年浙西之得，全靠先事处置之力。最后又归结到"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上来，并由此引出自己上疏的目的：今年浙西已见灾荒之兆，朝廷理应早作准备。这样的写法，与陆贽的奏议如同一辙。

善用复笔，文章有纡余曲折之妙；而多用排偶与顶真，文章就具流畅淋漓的气势。陆贽《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云："君子以爱才为心，小人以伤善为利；爱而引之则近党，伤而沮之则似公；近党则不辨而遽疑，似公则不覆而县信，是以大道每隳于横议，良才常困于中伤。"这段话环环相扣，珠连贯通，一口气就将"不考实而务博访之患"说尽。又如《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说："物贱由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这里写得上递下传，势不可遏，充分体现出陆贽奏议委备流畅的特点。

苏轼的文章虽已化骈为散，更显得纵横恣肆、流畅自然，但为了增加变化与力量，他也不排斥排偶的句式，也用顶真的手法。如《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说："臣访闻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虽积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无土可作田塍，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饿死之余，人如鬼腊。"这几句话语意连贯，节奏短促，气势逼人，更显出灾情之严重。又《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云："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写得首尾相接，回环往复，言召募雇佣之便利几不容人置疑。

陆贽与苏轼的奏议在风格上有相近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刘熙载说："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㉘苏轼的文章在笔势纵放、雄辩俊发上确实胜过陆贽，而陆贽的文章则在直言不讳、沈切剀至方面更突出些。所以，刘大櫆称：苏轼文章"虽自宣公奏议来，而笔力雄伟、抒词高朗，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陈条达明白，足动人主之听。"㉙这话是十分中肯的。

事实上，陆贽奏议对于苏轼的影响远不止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应该更大，但却难以句摘。从整体上看，宋代散文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特点，而苏轼更达到了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的境界。集之苏轼初次进京应试时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就已呈出此种特色。茅坤赞其"悠扬宛宕"㉚；沈德潜评曰："园熟流美"，"文势如川云岭月，其出不穷"㉛王世贞则指出："此篇只就本旨从疑上全写其忠厚之至，一意翻作三段，非长公笔力不能如此敷畅。"㉜这时候的苏轼既没有师承皇甫湜、来无择、孙樵一派文人，有意识地继承发展韩愈文章明白晓畅的一面；也没有追随欧阳修与之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中发挥自己的能力与作用。那末，苏文这种行文自然流畅、说理昭晰特点又是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它来自苏轼早年所读的战国、两汉文章，来自陆贽的奏议。尤其是后者，委婉流畅、析理精当、"谈事而文，俳而不厌"㉝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陆贽奏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十分深刻的。因此，从苏轼散文风格的形成这一点来看，宋代古文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完全是建筑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基础上的。更何况，在宋代推崇陆贽的也不只苏轼一人。《瑞桂堂暇录》就称：欧阳修“作奏议，庶几陆宣公”。苏轼也明确指出：欧阳修“论事似陆贽”。[34]而且，《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余篇，以为后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33]北宋文史大师们对陆贽奏议如此重视，甚至不惜效法模仿，这种现象是值得引起后人注意的。当然，就此加以推理，将宋代散文平易流畅、善于论事说理的特点归之于陆贽奏议的影响，这未免过于武断和片面。可是，通过上面陆、苏奏议的比较陆贽文章的借鉴作用还是明确的，因此，与其说宋文继承并发展了韩愈古文中明白晓畅的一面，还不如认为宋代散文是继承和发展了唐文（包括古文与骈文）中自然流畅、论事深切著明的一面更为客观。

注：

①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

②⑮⑯ 《答虔倅俞括》。

③⑦㉚ 《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语。

④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⑤⑫⑭⑱ 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⑥ 《杭州召还乞郡状》。

⑧ 《唐宋文醇》评语。

⑨ 《中庸论》。

⑩ 《司马温公行状》。

⑪㉟ 《四库提要》。

⑬ 《与王痒书》。

⑰⑲㉗㉘ 《艺概·文概》。

⑳ 《唐宋文醇》引。

㉑㉔ 《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

㉒ 《朱子语类》。

㉓㉕ 《唐宋文醇》引黄震语。

㉖ 《古文渊鉴》评语。

㉙ 《古文辞类纂》引。

㉛ 《唐宋八家文读本》。

㉜ 《三苏文范》引。

㉝ 王世贞《艺苑卮言》。

㉞ 《六一居士集叙》。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